

喀麦隆官方双语政策的性质及失败原因

郑 崧

内容提要 官方双语主义是喀麦隆语言政策的核心，也是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之一。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和语言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同时，它是一种个人双语，而非国家双语。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加之不适应社会需要，喀麦隆官方双语主义没有成为促进国家政治一体化与社会融合的工具，反而构成导致社会不满与疏离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喀麦隆 官方语言 双语主义 语言规划

作者简介 郑崧，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金华 321004）。

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地区，这是造成其语言多样性和语言问题复杂性的重要原因。历史上，西方国家殖民主义统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喀麦隆语言问题是非洲语言问题的一个缩影。除了近 250 余种母语之外，喀麦隆还有从殖民统治者那里承继下来的英语、法语以及洋泾浜英语这样的混合语。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因种族与历史而形成的语言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独立后的喀麦隆在官方语言的选择及语言政策的制定上面临棘手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喀麦隆官方双语政策的性质，并结合官方双语政策在学校教育中的实践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官方双语政策及性质

（一）宪法对于双语政策的规定

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实施了不同的语言政策。一些国家将某种本土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如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阿拉伯语在突尼斯；一些国家则采用一种本土语言和一种外来语言作为共同的官方语言，如布隆迪的

官方语言为法语和基隆迪语，莱索托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索托语；另有一些国家采用一种外来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如贝宁（法语）、加纳（英语）、安哥拉（葡萄牙语）、赤道几内亚（西班牙语）等；还有几个国家采用两种外来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喀麦隆即属此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独立之前的这段时间，喀麦隆被英、法两国分而治之。40 多年的殖民统治给喀麦隆留下了两个分别使用英语和法语的社会文化系统。1961 年赢得独立并重新统一的喀麦隆面临语言种类很多、却没有一种全国性语言的局面，而当时其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则是维护国家统一。因此，像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喀麦隆自然地选择“中性的”外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一方面避免语言冲突；另一方面避免庞大的财政和物质成本支出。独立之初的喀麦隆实行联邦制，由前英国殖民地西喀麦隆和前法国殖民地东喀麦隆两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国家组成。基于殖民统治历史及其遗产的特殊性和独立之初的政治现实，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将英语和法语共同确定为官方语言，实行官方双语政策。

这项政策在 1961 年的《喀麦隆联邦共和国

宪法》，以及1972年宪法和1996年宪法中都得到了确认。1996年宪法第一部分第三款规定：“喀麦隆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二者有同等地位。国家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双语。国家将致力于保护和促进民族语言。”除了上述宪法规定外，于1998年4月14日颁布的喀麦隆第98/004号法令（该法令为喀麦隆教育方针政策指导性法令）第一部分第三款中规定：“国家将在所有层次的教育中设立双语，以此促进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该法令第二部分第一款也强调：“国家保证进行不断的调整，特别是通过推进双语与民族语言教学，使教育系统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现状，适应国际环境。”

迄今为止，上述文件的规定代表着喀麦隆政府对本国语言政策的重要陈述，可能是双语主义作为一种语言政策唯一明确的指导性陈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3个突出的论题：英语和法语有同等地位；国家保证推进双语；国家在各层次的教育中实施双语。至于本土语言，在喀麦隆独立之初不占重要地位，尽管有一些机构和学者为宣传本土语言不懈努力。一直到1996年，修正后的喀麦隆宪法才明确规定支持本土语言。

（二）官方双语主义的释义与性质

尽管在宪法等一些指导性法令中明文规定奉行官方双语主义，但是喀麦隆缺乏有关官方双语主义的明确定义、详细说明和系统规划。因此，有关双语主义的内涵，主要见之于喀麦隆国家领导人，以及知识分子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所作的阐释。

20世纪60年代，喀麦隆著名学者冯龙认为，铭记在1961年9月1日的宪法里的双语主义将喀麦隆置于像加拿大、比利时这样的双语国家之列。不过，他指出，尽管这些国家很早就采取双语主义，但并非所有加拿大人都会说英语和法语，不是所有的比利时人都会操法语和德语，未来的喀麦隆则不同，所有喀麦隆人应该都会说英语和法语。他说：“我们应该设计的目标是个人双语，由此每名儿童在完成我们教育的教育后都能够说英语和法语。”“在我们的学校中，要实现的理想目标是培养能够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公民，甚至要培养按照他们的选择，能够用法语或英语撰写高质量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的公

民。”冯龙的这一个人双语主义的倡议主导了独立以来喀麦隆的双语政策。

1962年，阿希乔总统在布亚莫雷克双语法学校的落成典礼上说：“我用双语一词指推进我们的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法语在全国的实际运用”。“实际运用”和“全国”意味着个人和社会双语，意味着所有喀麦隆公民能够同样流利地使用英语和法语。1977年，阿希乔总统在雅温得公立双语中学的落成典礼上说：“对双语的逐步掌握应该尽可能完美；语言教学的水平不该像喀麦隆人自己所理解的那么低。”“我们的学校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公民，他们可以随意使用法语或英语撰写优秀的文学或科学作品。”

20世纪80年代后，喀麦隆政府对官方双语政策的定义是：“（1）教育体系层面的双语或学校双语。学校双语是指在从小学到大学所有教育机构中所发展的双语，或任何旨在鼓励两个语族的公民使用其平时并不说的某种官方语言而组织的课程。（2）政治机构、政府、公共和半公共团体层面的双语。后一种双语是指所有官方文件都采用两种语言公布，或者说必须用两种语言公布。这些官方文件包括政治性演说、总统令、行政命令、公告等。”

从上述喀麦隆有关官方双语主义的法规、政治领导人和学者的阐述中可见，喀麦隆官方双语主义具有政治、文化和语言方面的不同属性。政治性的官方双语主义把双语主义作为一种保持政治一体化的策略，把双语主义与领土的完整性，特别是英语区喀麦隆和法语区喀麦隆的和睦团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上的官方双语主义包

Camero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1996.

Cameron, "Law No. 98/004", April 1998.

Isaiah Munang Afafor, "Official Bilingualism in Cameroon: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Status of English in Official Domains", Unpublished Dr. of Ph.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reiburg, Germany, 2005, p. 46.

Ibid., p. 45.

Isaiah Munang Afafor, "Official Bilingualism in Cameroon: Instrumental or Integrative Policy?"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ed. James Cohen, Kara T. McAlister, Kellie Rolstad, and Jeff MacSwan, p. 135, <http://www.lingref.com/isb/4/009/KB4.PDF>.

括：承认和维护制度传统中所存在的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最突出的就是保持法语区和英语区不同的教育与司法制度；语言学上的官方双语主义，指在行政领域和私营部门的正式领域保证与推进平等使用两种官方语言。

就喀麦隆而言，政治性的官方双语主义尽管是隐秘的，却是首要的，高于一切的。这是因为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后的喀麦隆一直面临分裂和政治统一的脆弱性问题。对于喀麦隆来说，这一致命问题不是来自因民族众多而具有的多元文化，而是来自法语区与英语区之间的分裂倾向。喀麦隆政府希望通过官方双语政策维护英语区喀麦隆与法语区喀麦隆的政治统一和民族融合。

此外，喀麦隆官方双语主义强调个人双语而非国家双语。在像加拿大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选择了国家双语（State Bilingualism），即在国家层面和公共生活中，两种不同的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公民以一种非竞争性方式使用官方语言。但是，根据冯龙教授的建议，喀麦隆选择了个人双语（Individual Bilingualism），其远景是每个喀麦隆公民都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

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

在喀麦隆，学校双语教育是推进官方双语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喀麦隆政治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和法语的公民。因此，从1961年开始，喀麦隆就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双语教育。

在联邦共和国时期（1962~1971年），喀麦隆就在以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的西喀麦隆和以法语为第一官方语言的东喀麦隆所有中学里开设了第二官方语言课程，全体学生在中学教育阶段都要学习第二官方语言。1962年，当时仅有的一所大学——联邦大学也开设了第二官方语言课程，且以英语和法语为教学用语。

1972年，喀麦隆废除联邦制，建立单一国家——喀麦隆联合共和国。1975年，喀麦隆决定在初等教育的最后三年实施第二官方语言教学。法语区的小学生要学习英语；英语区的小学

生要学习法语，每周均为2.5学时。1985年，喀麦隆政府意识到其行政部门还不是一个使用双语的行政部门，其工作人员的双语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创建“领航语言中心”，为公务员以及欲学习第二官方语言的喀麦隆公民提供第二官方语言教育。2000年，喀麦隆共和国初等和中等教育部宣布了推进双语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在小学各年级中开设第二官方语言课程，小学毕业时进行第二官方语言书面和口语测试。喀麦隆政府的目标似乎是，通过尽早将双语引入教育，使更多喀麦隆人能熟练掌握第二官方语言，同时为大学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打下基础。

1962年，当喀麦隆第一所公立大学——喀麦隆联邦大学建立时，即明确学校为双语大学。当今，喀麦隆共有6所公立大学，其中包括4所双语大学、1所英语大学和1所法语大学。这4所双语大学以英语和法语为教学语言，讲英语者和讲法语者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师可以使用任一官方语言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用任一官方语言做笔记、答题和做作业。

然而，官方双语在喀麦隆大学系统的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1）许多大学新生并没有做好接受双语教育的准备。中小学双语教育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缺乏合格师资，教学方法落后，学生与教师都缺乏学习或教授第二官方语言的动机，国家没有制定清晰的语言政策，等等。其结果是大学不得不为这些新生重开第二官方语言培训班。然而，这些班不仅教学组织欠佳，而且同样缺乏必要的设施与设备，加之学生学习不够努力，其结果当然是不成功的，学生考试不及格率很高。根据恩杰克的一项调查研究，在雅温得第二大学，88%的被调查者表示，当他们用第二官方语言听课时，在理解上存在困难，82.7%的被调查者透露，他们在写、说、理解第二官方语言方面能力一般（50.5%）或不好（32.2%）。（2）大学里的法语与英语教学语言

See Issaiah Munang Afafor, op. cit., p. 131.

Jean - Paul Kouega, "Bilingualism at Tertiary Level Education in Cameroon: 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of Yaounde II (Soa)", p. 6, <http://www.isb6.org/static/proceedings/kouega.pdf>.

运用是不平衡的。在喀麦隆的大学里，绝大多数教师用法语授课、出题、评价。例如，在雅温得第二大学，法律与政治系采用英语和法语授课，但使用法语授课的课程占 2/3 以上，而经济与管理系则只用法语授课。相比较而言，运用双语教学的这种不平衡状况使许多讲英语的学生难以有效获取和吸收课堂知识，且难以在考试和评价环节中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从而丧失了很多成功的机会。在 1998 年 10 月雅温得教育学院理科入学考试中，没有一名讲英语的喀麦隆人通过考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考题都是使用法语。(3) 由于大学师生绝大多数来自法语区，因此校园中的交际语言主要是法语。大学官员与工作人员基本上用法语同学生交流，学校的通知一般使用法语，除非涉及学费。这种语言环境让讲英语的学生感觉居住在一个陌生世界中，如果他不懂法语，他就必须离开，没有选择。正是这种疏离感促使学生在居住的旅馆里建立起语言“飞地”，使用同一语言的学生聚居在一起。因此，说英语的学生存在某种挫折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双语主义是法语化和让讲英语的人贫困无力的委婉说法。”

总的来说，官方双语政策在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实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官方双语政策失败的原因

喀麦隆的官方双语政策承载着推进文化共享、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使命，但实际上喀麦隆的官方双语政策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发挥了一种促进国家一体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成为一种导致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从 40 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一政策没有达到其政治、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目标，是失败的，它在教育系统中的实施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双语主义以及双语教育是一个受多种因素限制的问题。按照柯林·贝克的看法，双语教育要考虑几个限制性因素。他说：“双语教育，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除非将它与社会中的基础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否则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双语教育不仅仅反映课程决策。相反，双语教育是被有关少数族语言、少数族文化、移民、机会平

等、个人权利、语言少数群的权利、同化与融合、隔离与歧视、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等基本信念所围绕和支撑的。”但是，如前所述，喀麦隆官方双语主义是主要基于维护国家政治一体化的目标而作出的选择，它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因此，喀麦隆在建国之初将官方双语主义确定为本国语言政策的核心时，并没有对影响一项语言政策的政治、文化、语言、社会、教育等限制性因素进行全面思考。这种政策制定上的先天不足在喀麦隆建国后的 40 多年里一直没有改观，这就决定了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系统的规划。况且，它没有从语言学角度对官方双语主义作出清晰的界定和说明，没有制定过有关官方双语政策或双语教育的具体法规，没有确定过官方双语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它没有从社会角度就如何保护少数语族的权利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没有从教育角度对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官方双语教育的合理性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坚持不懈地改进制度环境，投入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切实推进个人双语主义，以及双语教育。

除了缺乏系统的语言规划外，喀麦隆这种实质上是个人双语的官方双语政策还基于错误的假设。吉赛尔·琼吉说：“(喀麦隆的) 双语政策是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错误可能一开始是无意识的，归因于喀麦隆重新统一之初规划者的仓促——已经变成一个故意的错误：它假设所有喀麦隆人都会说英语或法语，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没有证实这一假设……”。琼吉在分析了有关喀麦隆官方双语的资料（其中部分是教育领域的双语）后得出结论：“事实上，自独立以来它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大。……在那个历史性时刻之后的 20 年，喀麦隆的双语——至少是官方支持的那种双语——仍

See Jean - Paul Kouegà, op. cit., p. 6.

See Jikong Stephen Yeriva, "Official Bilingualism in Cameroon: A Double - Edged Sword", In *A liz é* 19, 2001, <http://www2.univ-reunion.fr/ageof/text/74c21e88-308.html>.

Ibid.

See George Echu,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Cameroon", http://www.linguistik-online.de/18_04/echu.html.

Colin Baker,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3, p. 247.

然更多的是一个希望而不是现实。”喀麦隆希望通过学校的双语教育让未来的喀麦隆公民熟练掌握双语，但今天能真正熟练运用双语的喀麦隆人仍微不足道。喀麦隆官方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与其说回应了民众的语言需求，不如说是为了捍卫政治目标。从根本上说，官方双语政策和双语教育的失败在于喀麦隆政府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并非所有喀麦隆人都需要官方双语，需要使用双语者主要是社会精英，而不是广大的普通工人、农民。后者所需要的是比较熟练地掌握一种官方语言，而不是两种官方语言。此外，喀麦隆实际上难以在短期内实现个人双语，因此面临沟通“真空”的危险。尽管许多喀麦隆人掌握了双语，但是绝大多数喀麦隆人仅仅用一种官方语言。他们中一些人在与其他喀麦隆人交流时，只使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如果对话者也只懂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会说，“喀麦隆是一个双语国家，你肯定明白我所说的”。这种态度在喀麦隆社会中引发了严重冲突，许多喀麦隆人因此丧失了各种机会，甚至被剥夺了表达的自由。

导致喀麦隆官方双语政策失败的原因还在于法语和英语在喀麦隆社会中地位的不平等。按照喀麦隆宪法，英语和法语享有同等地位。独立之初的联邦制也保证喀麦隆英语和英语文化的独立性。但是在1972年后，随着废除联邦制和逐步取消英语区自治权，英语和法语的地位因各自的人口和区域面积的差异（相当于1:4）而发生重大变化。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法语区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地位，操法语者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一直占据高级职位。由于这种人口、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在行政、教育和媒体中，相对于英语，法语强势地位非常明显。事实上，在语言、文化和政策的表述中，法语在所有领域都影响更大，而在官方领域中，英语受到轻视，许多官方文件只有法语版，而无英语版。即使有法语版文件，也常常因翻译质量差而使其有效性和权威性受到怀疑。随着英语区自治权被逐步取消，作为

少数语族，讲英语的喀麦隆公民感觉自身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他们看来，旨在实现政治一体化的官方双语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同化政策，最终目的是法语区兼并英语区，使英语文化趋于消亡。正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官方双语政策导致了喀麦隆讲英语者同操法语者的疏离与分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语区问题”，即喀麦隆英语区要求独立和自治的问题日益成为喀麦隆一个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此外，喀麦隆的官方双语政策还长期存在激励机制问题，即鼓励喀麦隆公民去学习和熟练掌握双语的机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掌握双语的喀麦隆人几乎不会因自己掌握双语而在职务津贴、任用、晋升等方面受益。相反，他们的遭遇使他们最后被迫相信，掌握双语是一个祸根，而不是一个资产。例如，在公共机构中，这些掌握双语的人常常不得不免费充当翻译，而在政府中占据高级职位的人常常只会使用一种官方语言（几乎都是讲法语者），这不得不让那些掌握双语的人感慨“国家双语不过是一个口号”。

摆脱殖民统治以来的非洲国家在语言问题上面临困境：是沿续从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语言和教育制度，还是将它们作为不受欢迎的殖民遗产抛弃掉，转而选择本土的语言和教育制度？喀麦隆的这一案例说明，基于历史与现实，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殖民遗产，但是如果没有任何系统规划，如果没有考虑本国人民的实际需要，这份遗产必定是一份“负资产”。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Gisèle Tchoungui, "Focus on Official Bilingualism in Cameroon: Its Relationship to Education", in Edna L. Koenig, Emmanuel Chia, John Povey, eds., *A Sociolinguistic Profile of Urban Centers in Camero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Grossroads Press, 1983, p. 114.